

《长兴学记》浅议

A Brief Analysis on *Changxingxueji*

杜江宇*

摘要

《长兴学记》是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进行教学时，亲自手订的学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康有为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该书作为其教育思想代表作之一，展示了康有为早期的教育教学思想；也代笔了晚清时代中国旧式学堂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幕。通过该学记我们还可以看到科举教育制度走到尽头时仍然活跃的民间学堂教育活动。由于晚清激变曲折的时代特征，我们还可以从该学记中读到即将发生的中国近代学校制度的到来。本文以“万木草堂”为晚清中国众多或先进或保守之学堂的缩影，探求中国教育史上这一重要转折时期，同时，通过对作者学术思想的解读探寻中国传统儒学文化最后一批奉守者的传承精神。

关键词：《长兴学记》，万木草堂，时代精神，康有为，士子

一、引言

《长兴学记》^[1]，顾名思义，长兴书院的学规。借用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中的一句话“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3]”本文也将以康长素和他的《长兴学记》放置在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解读其人其书所包含“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4]”的奋发精神。

学记：学规也，其词源于《礼记·学记》^[5]篇；《长兴学记》便是晚清时期位于羊城长兴里三号的“长兴书院”学规。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租借长兴里的“邱氏书院”^[6]作为讲学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进行政治活动，遂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1892年，学堂迁至卫边街的邝氏宗祠（今广卫路附近^[7]）。1893年，因为新入学者数量激增，遂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8]）。人们将康有为在这三个地方所办的学堂统称为“万木草堂”。

讲学堂开办之初取借地名，故称“长兴书院”。1893年，弟子陈千秋提出意见，认为翰林梁鼎芬《赠给康长素布衣》^[9]诗句“万木森森一草堂”建议取名“万木草堂”其义极佳，旨在

“将倾之大厦，必须有万木扶持，而非一木所能胜任，故欲集天下英才而教之，冀其学成，群策群力，以救中国。^[10]”以表达康之政治抱负。同时考虑到翰林院庶吉士对科举士子中的巨大政治号召力，康有为同年冬天迁学堂于广府学宫仰高祠时，正式挂起“万木草堂”的匾额。

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1]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维新变法的人才。本文便以康有为为“万木草堂”的学规《长兴学记》为蓝本和核心，进而对早期康有为的教育思想进行论述：首先通过此学规探求早期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中的教育目的及作用，康有为教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关系等；这些教育思想虽然充满了时代的特殊性，但是其中又有抽象的超越时代的教育价值。我们在认识康有为早期的教育思想的同时，不应该以时代的差距轻率的为之扣上“保守”和“改良”的政治语气词。而是要将其放置到中国俩千年来的教育发展史线条上来观察和认识。其次，通过《长兴学记》为例，对于晚清最后一批旧式学堂进行一次概要的认识，给予其应有的评述，以及这些学规中的精华进行继承。最后通过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了解其教育思想在此前后的变化。

二、《长兴学记》之学规意义同康有为儒学思想的厚积薄发

（一）、《长兴学记》形成的背景

《长兴学记》是康有为一生的主要教育著作，也是康有为所创办新式学堂实验教学的蓝本和学堂规范。在羊城办学八年，此学规未作更改^[12]；后康门弟子广布各省，有创办学堂者亦以此为学规。如弟子梁启超在湖南长沙所创办“时务学堂”^[13]；亦有新式学校任教者也以此学规为规范。后值新文化运动，进而民国政府强制推行国语（白话文）^[14]。文言之《长兴学记》瞬逝，然其精神未失。无论是民国初年各新式学堂所特别倡道之教育精神“德”“智”“体”“艺术”，还是京师大学堂之“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学校设备、学校教育沿革等”无一不是文言本《长兴学记》之映射。本文并非强调康有为《长兴学记》之独特至高地位，而是将其置于新旧学堂交接之际的晚清做一个时代教育的标签进行解读。

关于《长兴学记》成文年代有俩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为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15]（我史）和《万木草堂丛书目录》^[16]中所记录的1891年；直到当代，不论是大陆方面马洪林先生编注的《康有为集》^[17]八卷本，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的《康有为全集》^[18]十二集本，还是台湾年宏业书局出版的《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19]二十二集以及同年康同璧、任启圣先生编校的《万木草堂遗稿》^[20]。这些文集关于《长兴学记》的成文年代全部记录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始开堂于长兴学里，讲学，著《长兴学记》……《长兴学记》于光绪十七年夏四月（1891年5月至6月）由广州万木草堂刊行……^[21]”第二种说法几乎微不足道，乃至无人问津，然而出处却是很重要。在梁任公先生《饮冰室合集·三十自述》^[22]中有这样的记载，梁任公在文中曾重点提到：影响他最深的，第一是康有为的那部《长兴学记》。“稍长游南海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俯焉孜孜从事焉……^[23]”梁启超那年游学的时节，他父亲琼山先生别无嘱咐，单给他一部《长兴学记》，说道：“这是我老友南海康君发挥先师的微言大义，来训练

后学的，内中所讲，便和我自己讲的一样，你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罢……^[24]”根据梁任公的记述，以及他游学时间的推断，这个时候应当是其17岁，光绪15年（1889年）。再根据台湾师范大学张朋远先生对梁启超的各类记述，特别是其《梁启超与清季革命》^[25]中的记载，任公之父琼山先生赠其《长兴学记》应当是其17岁即光绪15年。如此则《长兴学记》成文年代便值得商榷。然而其虽有异，但并无大碍。大众普遍认为当是第一种说法，因为《长兴学记》既是长兴里讲学之学记。1891年康有为才迁至此处学堂，故梁任公之记载当有偏颇。然而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其实另有一番解释。比如说，当我们谈论康有为在广州所办学堂时候，常常用“万木草堂”来概括，然而“万木草堂”之名来源却是光绪19年（1893年）开始方便于名称的统一众多书籍亦常常写作“1891年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此非笔误，更非记载前后不一，《长兴学记》便是如此^[26]。

康有为此前在南海银塘乡居之时，曾经为本家诸弟授读，偶尔也收教过别家的子弟。关于学堂教学的问题也写过类似的文章。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应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请求，所以刊印《长兴学记》以为学则，后有陈千秋跋。

（二）、从《教学通义》到《长兴学记》——由宣教至实验教学

早在光绪十二年（1885年）康有为所著《教学通义》^[27]“原教篇”“备学篇”“公学篇”“私学篇”“国学篇”“大学篇”“六经篇”“幼学篇”“德行篇”“六艺篇”中便有《长兴学记》所记教学精神的影子。然而《教学通义》并非一般的论述教学问题的诉述，而是论述国家礼教伦理与事物制作，以及官师合一，六官皆学，公学与私学并立等问题。它从一个整体宏观的角度，结构性的述说中国古代王朝‘士绅官僚’机构通过‘礼教科举形式’的良性循环进行运作；这种科举礼教形式又通过儒生在学堂开讲求学的基层构造，不断输送去应试的儒生学子便成为这个国家机器有效运作的燃料；中国古代的文化软实力掌握在士子的手里，这个士子阶层构成了这个王朝良性循环的新血液。而这个“士”阶层和国家机构的职业操纵者之间的纽带便是传统的经、史文化，《教学通义》便是全面描述从周公到晚清时期的学子士人所受官学教育的内容和范围、乃至精神层面的规范。用当下的语言形容，就是国家颁布的符和规定的教科书范围，以及精神方面的宣教（政治宣教）。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论述的这些传统文化往往表现在中国传统士子的精神层面。它的名字或称“仁”“义”或作“经学”“玄学”或作“理学”“心学”乃至“今文”“古文”；这些抽象的名词就是中国古代官学教育的图腾。它掌握了王朝政权的合理性；掌握了王朝运作的理论导引；掌握了普通百姓奋发的方向；掌握了乡村舍里最圣神的道德标高。如果说《长兴学记》是以文言文为手段的新式学堂的学规，那么《教学通义》便是《长兴学记》的学规。

康有为著《教学通义》，指出“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28]”。康有为完成此书的时间尚不确定，在中国清史编纂委员会新编修的《康有为全集》中附记为光绪11年（1885年）；然而在《康南海先生年谱》中记载为光绪12年（1886年）这个时期正是康有为还乡澹如楼，闭户读书，深刻思索“合经史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曠变^[29]”之际，中国古代王朝官员、儒生思考论述历代或者当代的政治制度最先一门往往是食货，次论选举（即所谓国家的教育沿革、制度）康有为一介书生，群书目的为“济世经世”“以天下为比可为”为

理想，其所论述从教育到职官。可以说这个时候便是康有为准备从中国古代王朝的教育精神核心为出发点和着眼点进行自己的“悟久速齐同之理，推太平之世宙”的人生抱负。

（三）、“万木草堂”之学规《长兴学记》的教育内涵和外延

《长兴学记》统筹勾勒了长兴学堂的兴办宗旨和教学内容，也代笔着康有为厚积薄发的学术功底。付诸实践的主体便是“万木草堂”从创办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的教学活动。学记的理论指引和学堂的实践活动相辅相成，阐述了康有为在1891年左右的教育主张和他本人前期教育思想的积淀。所以论述《长兴学记》之特点必然和康有为前期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思想、康有为亲身经历的学堂式授业方式、广州乃至各省各处中西学堂办学特点、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助学理念、以及康有为办学宣传维新尝试学堂改制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解构《长兴学记》。从而以一种全面的，从外围到内核逐层剥开，使其置于其所属时代的属性，进而解读康有为学记所产生的时代张力。

康有为在研究了我国古代书院的教学方法和当时在上海、广州新出现的‘洋学堂’教育优点的基础上，通过《长兴学记》为纲领形成了“万木草堂”独有的教育模式。

前文通过‘《教学通义》到《长兴学记》’阐述了康有为教学思想从宏观到微观的脱变，并且将其放置在中国古代“官学合一”的特殊环境中进行一番简单的说明。

“万木草堂”即为《长兴学记》之载体，实为形、神之关系，缺一不可；二者必然放置在一起才能更加全面认识该学记的内涵。“万木草堂”的兴办，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载，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他在北京感于“国势日蹙^[30]”，乃以布衣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31]”，然遭到朝廷和达官们的攻击，被弃之不理。康有为在京观察时局，深感朝政腐败已极，继续留在京师已无可作为，遂决意回粤，“将教授著书以终焉”，着意于培育人才。一八八九年底，他回到广州，次年先有陈千秋、梁启超等投于门下求学，后来他们又互引亲友来学，渐渐增至二十余人。于是应陈、梁等人之请，于一八九一年“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

《长兴学记》承继了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先生主讲“礼山草堂”^[32]的积极一面，如不习八股、自立日记、设置学长、激厉气节、注重经世济民等等。尤其是朱次琦先生“济人经世”的思想这些都贯穿之日后“万木草堂”的教学实践中。

广州是岭南两粤的人文首区，岭南又是晚清没落后受西方文化冲击最深的地区，岭南不仅有扎实的传统儒学风气，在鸦片战争后侵入当地西方强势近代科学文明也咄咄逼人。这俩种不同文化的激烈对撞所产生的抵触和融合，可谓开中国近代保教之先声、西化之先驱。当时城内外的书院、学馆林林总总，可惜绝大多数都只教授科举考试的那些内容。尽管如此，教育领域毕竟已经在起变化。若干著名书院如“学海堂”、“菊坡精舍”、“礼山草堂”、“广雅书院”等，虽基本上仍囿限于传统文化范围，还能不习八股，而以经、史、性理、词章、训诂等学为内容，并增设舆地、历算等实学科目，提倡经世致用。《长兴学记》便借鉴吸取了“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书院的有益经验，

晚清时期，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美国。这些幼童之中，粤省穗府籍贯者占数大半。广州的官办洋务学堂，如广州同文馆、广东水陆师学堂等，皆开教有相当系统的西学课程。西方人在

广府地区民办西式学校，如南华医学院、真光女校、培英书院、培道女学堂、格致书院等。这些情况，显然也会对同城后起的“万木草堂”，形成积极学习西方知识的教育方向，发生影响。限于资料有限的原因，我们不能找到当时这些西式学堂的学规与《长兴学记》进行比较。然而以康有为之魄力也仅仅在补“六艺”之学中，将西方知识融入“致用”；可谓最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个例也说明了当时“官学合一”的教育氛围，书院、学堂的职责还是为了培养应对科举之学。作为一个全国体制性的问题，《长兴学记》还是带有浓重的传统学堂的时代任务。

“万木草堂”并非、也不可能是康有为个人的凭空创造。它与当时的传统旧式书院、官办洋务学堂、外人私办学校等的教学背景不可脱离。故《长兴学记》也对这些学堂的学规有所承继，有所借鉴，有所改造，有所创新，而后形成康有为教育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为“万木草堂”的独家特色形成了理论上的指引。

三、《长兴学记》中的中国儒家传统教育思想

（一）、《长兴学记》中体现的学堂制授业形式所特有的修身思想

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从宋开始就一直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33]的人生恪守。士人学子修身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从小到大所收熏陶的传统风俗习惯和学堂中的修身教育。同样，在学堂中这些教学‘修身’的教材也是儒家经典的经、史文章，《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的学规，这种教育必不可少，还要放到首位。故‘学记’开篇第二段便讲述人之性与‘学’，然后从‘性善之说’与‘性恶之说’转至‘有性无学’论述人为何要学，学习的本质是人的本性，如果不学习那么就没有人禽之别。学习的目的首先为了有别与世界万物。其次“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同是学人也，其人与人相远。故人必修身学问”，康从人的本性，人所有的社会属性出发，打造一个基本的人之人格，道德之人格。今天我们用“道德”一词来形容个人的修身养性。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特别强调了‘格物’‘历节’‘慎独’‘养心’‘习礼’‘笃行’‘孝悌’等等的个人修身思想。

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学规在修身教养方面同全国的学堂一样，以“六经”为教材展开论述修身的根本之道和基本范畴。《学记》提到“天下道术至众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义理之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为至该”。这里所提到的‘天下道术’‘义理’‘志于道’‘据于德’便是传统的修身之道的概念性语言，它们直接指向了士子的个人道德伦理和规范。

明清时代的学堂和现代学堂有共同之处，这便是在教授基本知识外一定要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品德。用当今时尚的话便是先“做人”后“做事”、“德才兼备”等。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所特别指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修身纲目并不奇特，也无出彩，因为晚清的其他学堂学规也都有此类的道德规劝，而且各地官办学堂都有此类条文。《长兴学记》特殊之处是康有为之着眼点在《论语》的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归根结底各处学规的修身思想是一致的，全部是劝人做一个道德的完人，哪怕以此为心性标杆，使士子心向往之。

我们通过《长兴学记》可以了解到一些超越时代的精神，那就是不论何时何地作为社会人的一分子要有特定的行为规范，作为个人来说不仅要有基本的人格标识，还要“慎独”。无论在

古代还是今天修身和习艺是学校教育中同等重要。我们可以把《学记》当做了解晚清旧式学堂个人道德教育的一个窗口，认识晚清历史，认识教育中永恒不变的本质。

（二）、以儒家传统经典文句为学规，以经典文句为诠释的学规

《长兴学记》是一篇治学修养论，它的学规意义条理分明，概括了儒家教育典范的各个方面。康有为用独特的结构分注条目，编组学规，以示士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学记》中发现康有为对传统教育文化的理解。可以说《学记》体现了康有为厚积薄发的儒学功底，这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学记》中大量运用了儒家传统经典文句。这些文句构成了学规的骨骼，同时作者还运用经典文句进行诠释和补充。

《学记》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为什么学，如何为学，学之方式。取先贤学之论述以为纲，并糅合自己的想法。第二部分论述学堂所学之内容，此部分一半的篇幅都是引用古往今来的大儒言论。从此处也可看出康有位在儒学中的取舍，以及他的儒学学术源流。

开篇第一段在论述“勉强学问”之处，康有为引用董仲舒之学说，董子为有汉以来开国学第一人，其作为今文经学立场的第一人，被康有为引用，从此处便可以看到康有为经学立场的态度。后续篇幅未提到任何两汉古文经学大儒。

《学记》第一部分在论述“人之性”同为学、能学的关系时候特别强调了孟子和荀子之学说，中国古代教育史中一直有“性善”“性恶”之歧。此间的代表源头便是此二人。康有位在自己的《学记》中并不特别强调孰是孰非，而是从整体的角度叙述：“孟子性善之说，有为而言”“荀子性恶之说，有激而发”认为二者为合，不得强分。在此处康有为还特别引述孔子、孟子，荀子、告子、王充、韩愈、程氏兄弟、张载、朱熹对于性善性恶之争论，在这些圣贤的研辩基础上阐述自己在《论性篇》的宗旨。可谓‘罗列数家，全面观察’。

在论述教学方式的部分，康有为引用孔子“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认为近世士人不仅要通过著书的方式为‘往圣守绝学’；还要通过开学堂讲学的方式‘为后世传绝学’。这种积极的提倡儒生有担当的精神在我们当代也是值得提倡，比如大学中的老先生为本科生代课，上基础课等等。通过顾亭林、江藩、戴震、段玉裁等人的讲学态度告知学子讲学也是传授学问中重要的一环。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康有为特别从“始于为士，终于为圣”来勉励门生。然而康有为并不是一味的做引述，每处论及教学之问题时候必先逐一引述前人的观点然后进行自己的观点的陈述。

在《学记》的第二部分康有为重点讲述了学习的内容，这部分关于“经”“史”“词章”“六艺”的内容更是展现了康有为对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的深刻了解，旁引博证，娓娓道来阐述了学习的范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晚清学子为了应科举而必修之主体学问。

四、《长兴学记》中的超越价值与现代教育学的差异比较

（一）、《长兴学记》中的超越精神价值同它的时代价值

本章借用冯有兰提出的一个哲学名词“超越精神”来抽取《长兴学记》中所包含的特殊价值和脱离时代的抽象精神来看待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席之地，同时找寻康有为本人教育思

想中超越时代的特殊精神。

由于时代的不同一种有价值的精神往往有其时代的属性，但是在这个属性的下面会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把历史环境和当时的历史现实抽离出去，抽象继承其超越时代的精神。用近代的学科语言解释《长兴学记》这部教育著作，教育学是当代西方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中国自古就有“教育学”的内涵，这仅仅是称呼上的差异。由于时代的不同，站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教育方式和教育原则同当代的教育模式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育人思想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英国学者培根在《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1623）一文中，首次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提出，这是将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看待。中国近代教育的形成时期是在晚清民国初年，作为旧式学堂向近代学堂转变的“万木草堂”便是其中的代表。以它为代表的中国王朝制度下的民间学堂的转变也是中国近代学校形成的前奏。作为期间的学规代表，《长兴学记》不仅酝酿着新式教育的种子，还包含了中国传统教学用语的近代化。由于文字和教学科目的巨大变化本文不认为传统学规和近代教育史完全隔离的俩个教学观。相反，中国的近代教育恰恰是在集合了中国旧式学堂的教学宗旨和西方现代教学科学观的基础上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形成了早期的中国近代教育学，他不同于苏联的“合作教育学派”也不同于欧美的“实验教育学派”。而是从中国传统的教学原则蜕变出来有着欧美教育学外衣的中国近代化教育观。

《长兴学记》给人的直观映像是完全的传统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或者在补“六艺”之学中我们能看到康氏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子，我们称之为‘进步’。但是此处的西学影子仅仅是科目的增加，我们要看到中国古代的学堂教学是和科举取士联系在一起，教学的现实目的是为了科举。尽管在《长兴学记》这个学规并没有达到近代教育的规范化，到是可以看到几个直接的问题，那就是：讲学的教学功能，讲学中的基本要素，学堂教学的课程，教学的理论和实践。这同近代中国教育学的几个基本理念同出一辙，只不过我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认为旧式学堂和新式学堂之间的巨大鸿沟，进而割断期间的关系。

本文并不是运用《长兴学记》的片言片语强硬附会当代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只是以抽象的方式接续二者间的内在联系。试想民国初年新式学堂之授业先生，无一不是在接受传统学堂的培育下完成自己学业，然后执教新学堂；即使有留学归国经历的老师无一不是国学基础厚实者，他们推翻改造的并不是自己从小所学的基础教育，而是在教育用言上进行了转承，如果我们把它们放置白话文运动的时代背景下便可以清楚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长兴学记》的意义就在于它本身链接了中国教育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观察其本身便是对其时代意义的一个判断，以《长兴学记》为一个剖面进行普遍性的推理。

（二）、《长兴学记》同当代西方教育学中基本概念的比较

社会经济变化的变化使得教育表象也发生了巨大差别，但是抽象的精神还是有其相似性，本文在论述《长兴学记》的教育功能便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时代的点上和一个本质的挖掘。剥离表面的时代特征便是首先要做的工作。当代中国使用的书面语和《长兴学记》的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当代中国的教学场所和晚清学堂也有巨大的差别；当代中国的教学学术语和晚清用语也是有同有异……在两者间的比较是一种相对的比较，是一种差异的比较，不会附会给《长兴学记》特殊的地位，更多的是用历史流变的角度滤清其继承性和特征变化。

当代教育学首先必讲教育的功能，包括教育功能的含义，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体现在《学记》中的术语就是“为学”的含义，为学是因为人之本性，为学的目的即为学的责任。此处不做三对概念的详细比较，但是特别强调时代之含义，学习或者教育的含义毋庸置疑，就是学习人类千万年来积累的生产、社会经验。晚清受教育的士子为小众，故他们肩负的责任很多，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在思想道德和社会传承经验上必须要做到一个楷模。而近代以来的普及教育，个人通过受教育做到约束好自身便是教育的成功。

第二，近代教育学提到教学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教育影响。“万木草堂”个人创办，康有为的学规、教育手段等既是自己的硬件和软件；当今教师有学规良多，而且是国家制定规范，此可谓“因时立教”。晚清学生有《弟子规》，今天学生有各种学生规章制度，教师教学模式各不一样，不同时代的教育主体还是未变。

第三，课程。教育要教授知识，这里便是俩者的巨大差别，《学记》中规范学生务必要学习的课程是当时时代的产物，课程变化之大，更是说明了那个激变的时代。当时学堂所规定学习的各种传统文化在今天的课程中统称国学，大部被归类到古汉语、历史学、文学专业。而且在课程中所占比重很小。今天的课程也是在不停的做调整，只不过是变化幅度不如晚清大。

第四，教学理论与实践。学堂的教学实践是参加科举做官，其理论便是“学以致用”今天的教学是普及的大众教育，社会上各个行业的分工细密，使得人们在受教育后的选择颇多。关于教学理论我们放置在下节内容。

五、 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中，《长兴学记》的地位

（一）、《长兴学记》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长兴学记》开篇从论性出发，说明为学的重要性。认为人性是人与禽兽共有的，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能够学习，指出“顺而率性则愚，逆而强学则智。”要求人们大胆违逆常规，积习、勉力从学，以成博学之人。

正文共三大块、十一部分，具体论述为学之要，含“学纲”、“学科”、“科外学科”三个方面。“学纲”以孔子《论语》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纲；在“四纲”之下又规定了若干学目，分别归属德、智、体；在“游于艺”下还包括六小项；在“科外学科”方面又分校中、校外两项，校中有演说、札记，校外有体操和游历。这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学生要在德、智、体几方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在德育上，学记写道：格物、励节、辨惑、慎独、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等传统的思想道德修养。强调为学当以仁为本：“周公、孔子垂学立教，以迪来士，皆以为仁也。”《长兴学记》提出“四耻”做为学生的戒条：以无志为耻；以与落后世俗风气同流合污为耻；以鄙吝为耻；以懦弱为耻。戒条鼓励学生涵养高风亮节，树立丈夫豪情，勇于担当重任。

在智育方面，规定学生要学习“义理、经世、考据、词章、礼、乐、书、图、枪”。也就是要求学生要学习各种经世致用的自然科学知识。不过他的这种智育范围比较广泛，即包括了孔子所提倡的“六艺”也赋予了新的时代性内涵。特别是“经世”和“考据”，所谓经世学，包括

了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外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际应和群学（社会学）；所谓考据之学，内容包括中国经典、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地理、数学、物理。这同我们今天中学学习内容基本一致。

在体育方面，规定学生要学习“音乐、舞蹈、体操、军事体操、旅游。”他还亲自撰写了《文成舞辞》，让学生伴随着鼓乐的节奏，边歌边舞，目的是锻炼学生的体质，陶冶学生的情操。

《长兴学记》内容反映了中西学并存的時代特点，体现了旧式书院向新式学校的过渡，不断引进西方新学，又保留了大量中国旧学，甚至包括经义、策问、诗赋、楷法等科举之学。作为一个受传统学堂教育成长的儒生，康有为以及同时代认识世界、学习西方的士子能在学堂教学中注入学习西方的新内容，毕竟是有巨大进步意义的。

（二）、“万木草堂”及《长兴学记》的时代意义

不管是当时、民国初年、今天，对于“万木草堂”，褒扬其新，有很多论述。然而笔者认为“万木草堂”的创办，与当时广州著名的书院、官办的洋务学堂、外人私办的学校等教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万木草堂”对于这样的时代有继承借鉴，有改造创新，而后自成“万木草堂”特色。“万木草堂”独特优越之处，在于从办学方针到教学内容，尤其学风，都努力贯彻与时俱进的维新改革精神。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认识康有为作为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的角色，尽管他早期的《长兴学记》是中国传统学堂学规的典范，然而其中也提出许多远见卓识的教育思想。诸如，首次明确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尤其强调“育德为先”、“德育为本”；大力提倡普及教育，重视实科教育；提倡并实行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学长制），提高学校行管效能等等。对今天乃至将来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当时的反对者叶德辉尽管写了《长兴学记驳义》^[34]来批驳其“外假大同之说，内溃名教之防^[35]”但是这是后期进行变法的时期，期间的政治斗争多于学术教育之争。梁启超曾说“万木草堂”和《长兴学记》：“其教育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36]”。后来梁启超常对人说道，他一生的事业，大半是从《长兴学记》、《仁学》两部书得来^[37]。……可见此书对于任公都有极深刻的启发。也可以说《长兴学记》是影响有影响的人。

《长兴学记》的时代意义有其值得纪念的意义，同时也不该忘记其负面影响，兼视兼察，庶免偏颇。《学记》所指引的学术、思想、组织、政治等内容，亦曾有缺点以至谬处。反映了早年康有为本人的学术风气和世界认知。不仅未能助益于康有为后来的的爱国进步斗争，而且于近代中国思想、政治发展亦有时代的阻挠。如果联系康有为后来的教育思想以及后来的世界观，其人本身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徘徊与激变。也可以说时代之特征，而非一人一事之特征。

学记中有大量牵强附会的学术习惯。文中大量引用先贤儒生的的教学观点，然后取之论据皆为其所喜欢之今文学者。在“补六艺之学”中，立论大胆有余，然而比喻不足，‘六曰枪中’于西学火器知之非深，而率意比附，有失科学之精神。其年鸦片战争过去半个世纪，对于西人科学技术之认知还是处于火器认知阶段，中国时代士子之悲怆。

六、 结语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之一。《长兴学记》是康有为在其所处时代综合古今中外教育特点制订的学规。学规中指出学生要“格物、历节、慎独、养心、习礼、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也就是要求学生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树立志向，重视名节，修习礼乐、注重仪表、孝敬老人、互助互爱。这些道德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仍具有启迪和借鉴的价值。《长兴学记》所体现的“勉强为学”，“逆乎常纬”的教育理念，在教育活动中所追求的“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精神，在教学实践中所确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开拓作用。

《长兴学记》是“万木草堂”的学规制度。康有为为学校建章立规，这个学规的核心就是要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以此为方针开展日常教育教学活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德，智，体几方面协调发展的教育思想。

由于康有为在民国成立后始终“保皇”的政治缘故，人们对康有为的非议和责难中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宣教情绪，因此对康有为在儒学和教育上的成就也多了许多不实的非议。事实上在民国这个抛弃传统的时代，康有为确实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康有为在这种政治和思想的困厄中不改其志的执着，也让我们在康有为人格中发现了可爱之处。本文贡献拙见，从康有为作为教育学者的一面。以及代表其儒学和教育精神的著作《长兴学记》为蓝本进行浅论。在我看来读《长兴学记》可以求得了解传统文化登堂入室之路径。在本文的书写中，着重从《长兴学记》中，向康有为学习治学之道，看他是如何指导读书人学习的，看他怎样回答与论述什么是为学、学有何意义、学之主体谓、学的目的又是什么。以此来提升个人的传统文化修养，为往圣守绝学。

千虑一得，也效他人抛砖，敬祈引玉。

参考文献

- [1] 本文论述《长兴学记》所引用文本以中国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的版本为标准。
-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康长素，商务印书馆，1997。
- [3] (同上)。
- [4]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引自李桂林主编《中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页317)。
- [5] 《礼记集解·学记篇》中华书局 2007。
- [6] 《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0。
- [7] 《广州历史地图精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 [8] 同上。
- [9]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 [10] 同上。
- [11] 《论语·述而第七篇》中华书局 2008。

- [12] 1891年长兴开堂至1898年查封.
- [13]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当时梁启超担任学堂实际管理者和中文总教习，重印《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之一.
- [14] 民国初年推行国语运动，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所以今天文言文之《长兴学记》读起来诘屈聱牙.
- [15]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又名“我史” 中华书局 1992.
- [16]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中华书局 1956.
- [17] 马洪林编注《康有为集》八卷本 珠海出版社 2006年.
- [18]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的《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9] 蒋贵麟辑《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宏业书局 1976.
- [20] 康同璧、任启圣先生编校《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
- [21] 康有为《长兴学记》序言（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三十自述》第六卷 中华书局 1989.
- [23] 同上.
- [24] 同上.
- [25]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一章》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 [26] 关于《长兴学记》的成书年代本文认为，该书是早年康有为的腹稿之一，开长兴学堂时完善定位学规.
- [27] 康有为《教学通义》（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8] 康有为《教学通义·原教篇》（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9]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0]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 中华书局 1992.
- [31] 同上.
- [32] 晚清岭南大儒朱九江先生在九江礼山开设的“礼山草堂”康有为在此求学，学堂授课注重经世济民等.
- [33] 《礼记集解·大学篇》中华书局 2007.
- [34] 《翼教丛编》卷三 中华书局 1956.
- [35] 同上.
- [3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三十自述》第六卷 中华书局 1989.
- [37] 同上.